

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¹ *

——基于成渝地区的实证研究

刘新智 周韩梅

【摘要】城乡融合发展是推进乡村振兴的关键举措，土地资源作为经济发展活动的载体，其优化配置是促进城乡关系进一步融合的关键纽带。通过成渝地区土地资源配置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特别是城乡经济融合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具有抑制作用；农用地边际收益的提高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非农用地边际收益的增加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较小的抑制作用；在政府干预下，土地资源配置、农用地边际收益和非农用地边际收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明显缩小。在城乡融合发展和土地资源约束日益加大的新形势下，提高土地市场化配置，增加农用地边际收益，是切实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土地资源配置；城乡融合发展；土地市场化配置；成渝地区

【中图分类号】 F3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012X (2023)—05—0040 (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政策体系。2021年12月，国务院颁布《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提出要提高土地要素配置效率，强调提高土地配置效率是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的重中之重。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前提是实现资源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而土地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促进土地资源在城乡之间优化配置，为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提供空间和制度保障。[1]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合理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可为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支撑条件，以实现共同富裕发展目标。因此，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议题。

我国长期处于城乡二元格局，导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配置不均衡。相比而言，在面临城乡资源自由流动受阻的情况下，城乡土地资源要素配置不合理的状况更为严峻。成都和重庆作为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肩负引领城乡融合发展的改革重任。[2]然而，成渝两地土地资源的低效配置阻碍了城乡融合发展进程。据统计数据显示，成渝两地的城区人口年均增长率低于建成区面积年均增长率，导致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化进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土地资源配置主要体现在农业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转换，[3]在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盲目加大对城市建设的投入，扩增城市建设用地，挤压农村地区生产空间，必然会导致城乡关系发展不均衡。土地作为经济活动的载体，其优化配置是城乡二元结构向城乡融合转变的关键因素，但在加速城镇化的过程中，城市建设用地的无序扩张，农村耕地布局的零散化，导致一些地区耕地利用粗放等一系列低效用地的问题时有发生。因此，如何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达到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是目前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¹ **【作者】** 刘新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周韩梅，博士研究生，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城乡融合发展研究”（2021ZDSC04）；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共同富裕目标下西部地区数字经济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实现路径与政策优研究”（CYB23087）。

二、文献回顾

理论层面，学者们基于我国城乡关系的演变历程，探讨并总结了我国城乡关系发展的主要理论问题；[4]实证方面，学者们围绕城乡统筹水平评价、城乡一体化测度、城乡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定量评价等内容不断探讨，[5]研究尺度多涉及省域、地级市等单元。[6]关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方面，部分学者从城乡互动的角度探讨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人口城镇化、地理和政策、产业互动、基础设施等因素对城乡关系的影响，[5,8]为探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研究基础。

近年来，从资源要素配置角度研究城乡关系成为热点。城乡融合发展也即是城镇化进程，从城镇化所发挥的作用来看，作为人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在城乡市场间流动、集聚、融合的纽带，新型城镇化是城乡融合发展中资源要素合理空间配置的有效手段。[9]学术界普遍认为，生产要素的错配均体现在劳动力、资本等要素上，但城乡土地的错配必然会导致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脱节，难以实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10]土地作为生产要素中最稀缺的资源，其高效配置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条件，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将继续提高我国经济结构转型程度。[11]改革开放以后，市场机制缓解了部分生产资源的配置扭曲，但地方政府在土地要素配置上还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地方政府的非农偏向是城乡融合发展滞后的重要原因。[12]如何实现城乡均衡发展，在土地资源配置方面，需要推进土地的市场化改革。但通过实证发现，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存在“低水平陷阱”，当前阶段的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更多体现为阻碍作用。[13]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就是要提高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效率，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核心是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14]

通过梳理发现，现有文献主要存在以下不足：一是侧重于对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分析，对于实证研究较少，并且实证研究的尺度大多沿着省、市等较大尺度开展，对于县域等较小尺度有待进一步补充；二是已有研究对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配置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但探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的关系的文献较少；三是已有研究将土地作为投入要素测算边际产出来探讨优化配置途径，或者以单位面积土地经济产出作为优化配置的标准，并未考虑到土地外部性特征，导致实证研究中未准确反映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实际影响。因此，鉴于城市与乡村的结合点在县域，城乡融合的重要切入点也在县域，本文以成渝地区的134个区县作为研究区域，基于农用地和非农用地边际收益最大化的土地资源优化配置视角，分析带有外部性特征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探讨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新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实施视角。

三、理论分析

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质是高效集聚配置资源，土地资源要素作为经济生产活动的载体，其高效集聚配置必将影响经济生产活动的价值体现。为此，在城乡融合发展过程中，必须认识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效率对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性。资源高效集聚配置是资源价值得到最大化的重要途径，不断调整优化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要素的合理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的关键所在，[15]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失衡将导致城乡土地权能不平等。[16]在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是要打破现有城乡地域系统中要素流动的系统性障碍，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必须正确引导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经济价值、空间价值和社会价值得到合理开发。

在经济价值方面，作为重要且稀缺的生产要素，在任何经济学理论中，土地都是经济活动必须依赖和利用的经济资源之一。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化能够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主要表现在：其一，耕地规模化经营既可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农户工资性收入，也通过农地租金提高农户财产性收入，进一步提升农户生活水平，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13]其二，地方政府的税收收入很大部分来自于土地税收收入，那么土地增值税、土地使用税等土地税收收入也就成为了地方税收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城市建设用地扩张被地方政府作为“财政增收”和“招商引资”的工具。[18]其三，土地作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抵押品增加了地方融资收益，土地融资成为地方政府财政和城镇化建设资金的重要来源。[13]自21世纪初，地方政府就将土地作为抵押物来获取债务融资。有研究表明，部分地区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外收入基本靠土地出让收入。[20]

在空间价值方面，土地资源的空间价值最直接的表现是土地城镇化，土地城镇化是农用地向城镇建设用地转化的过程，通

过耕地占补平衡政策，补充农用地占用面积，以保证 18 亿亩耕地红线。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将促进城乡空间开发，提升土地空间价值，使土地在城乡两部门配置之间得到有效利用，推动了城镇化发展，从而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13]有研究指出，由中央到地方的国土空间规划是城乡关系演化的重要力量，决定了农村发展的空间潜力。[22]

在社会价值方面，为满足经济快速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需求，农地非农化导致大量农民非农转移，不仅解放了剩余农村劳动力还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但农地非农化也导致失地农民丧失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从而不利于社会稳定发展。另外，在城镇化建设初期，地方政府注重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土地市场激增的财政收入将提升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带来公共福利的增长，从而提升土地的社会价值。[13]低效的土地资源配置使得土地空间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不到充分发挥，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下，也会阻碍城乡均衡发展。因此，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方向取决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是否得到充分发挥。

同时，“GDP 锦标赛说”认为，土地财政并非由财政压力倒逼形成，而是地方政府进行经济社会发展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结果。[24]其具体机制是：按照 GDP 和财政收入考核地方干部政绩的绩效考核制度导致地方政府间存在横向竞争，这种横向竞争促使地方政府加大土地征收和出让规模，以获取更多财政收入，从而推动土地财政的兴起。[25]以 GDP 和财政收入作为考核标准使得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跨区域再配置显然不利于农村的经济发展。[2]另外，地方政府还会出于利益需求，采取部分措施来分割城乡土地市场，阻碍要素的自由流动，从而不利于我国城乡融合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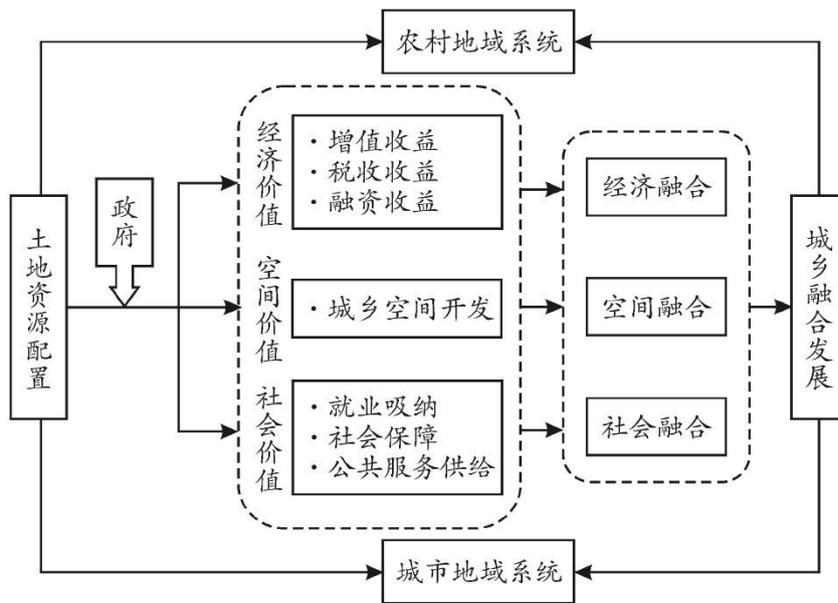


图 1 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

四、实证设计

1. 计量模型设定

为验证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本文构建以下固定效应模型：

$$Y_{it} = \alpha + \beta_1 Land + \beta_2 CV + \mu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textcircled{1}$$

其中， Y_{it} 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land$ 为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CV 为控制变量。 u_i 为个体效应， $yeart$ 是时间效应， ε_{it} 为随机误差项。

2. 核心变量选择与说明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是在维持现有城镇和农村特色的基础上，逐渐消除城镇与乡村之间在空间、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二元对立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27]因此，从城乡空间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和城乡社会融合 3 个维度下的 13 个指标构建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 1），运用熵权法来测度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2) 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现有研究对于资源的优化配置一般用帕累托最优来衡量，因此从帕累托最优理论出发，考察土地资源在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是否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土地资源在两部门的边际收益相等作为土地资源优化配置的代理变量。[28]具体推算过程如下：

首先，运用 C-D 生产函数来测算土地资源的净收益，假设存在两部门，分别为农业部门 1 和非农业部门 2，其各自的收益函数为：

表 1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目标	指标维度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或说明	单位
城乡融合发展	空间融合	城市化水平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之比	%
		交通网密度	公路里程除以辖区面积	km/万 km ²
		城市空间扩张	城市用地占农村用地之比	%
	经济融合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生产总值	元/人
		社会消费水平	社会消费总额占 GDP 比重	%
		社会固定资产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	%
		城乡产业结构	二三产 GDP 占一产 GDP 比重	%
		建筑业发展水平	建筑业总产值占 GDP 比重	%
		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粮食产量除以农业人数	吨/人
		城乡就业结构	二三产就业人数占一产就业人数比重	%
	社会融合	城乡教育水平	中小学在校学生数占总人口比重	%
		城乡生活环境	绿地面积占辖区面积比重	%
		城乡基础设施保障	政府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	%

$$R_1 = A_1 K^{\alpha_1} L^{\beta_1} Land_1^{\gamma_1} + w_1 Land_1 \quad (2)$$

$$R_2 = A_2 K^{\alpha_2} L^{\beta_2} Land_2^{\gamma_2} - w_2 Land_2 \quad (3)$$

其中，式②中的 K 为化肥施用量， L 为农业就业劳动力， $Land_1$ 为农业用地；式③中的 K 为资本投入， L 为二、三产业就业劳动力， $Land_2$ 为城市建设用地。鉴于农用地存在提供粮食、生态服务等功能具有正外部性，而建设用地增加将导致环境污染、公共绿地减少、城市拥挤等具有负外部性，[28]并假定土地的外部性是边际不变的。其中，农用地的正外部性 w_1 等于森林、草地、农田、水体的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乘以它们的面积比上农用地总面积，城市建设用地的负外部性 w_2 如式(4)所示：

$$w_2 = \frac{1}{n} \sum_{i=1}^n \left[\left(\frac{U_i}{u_i} + \frac{V_i}{v_i} + \frac{Z_i}{z_i} \right) \sqrt{\text{Land}_{2i}} \right] \quad (4)$$

其中，n 为研究区域内地区的个数， U_i 、 V_i 、 Z_i 分别为当年 i 地区用于治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的工业污染完成治理投资， u_i 、 v_i 、 z_i 分别为当年 i 地区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废气环境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物环保处理率， Land_{2i} 为当年 i 地区的建设用地面积。[28]

然后，计算总产出函数 $Y=R_1+R_2$ ，求经济学中的极大化值，表示为 $\max(Y)=R_1+R_2$ 。两部门的土地边际收益为：

$$MR_1 = A_1 \gamma_1 K^{\alpha_1} L^{\beta_1} \text{Land}_1^{\gamma_1 - 1} + w_1 \quad (5)$$

$$MR_2 = A_2 \gamma_2 K^{\alpha_2} L^{\beta_2} \text{Land}_2^{\gamma_2 - 1} - w_2 \quad (6)$$

再将 R_1 与 R_2 （非外部性）取对数求系数估计：

$$\ln R_1 = \alpha + \alpha_1 \ln K + \beta_1 \ln L + \gamma_1 \ln \text{Land}_1 + \delta_1 + \epsilon_{1i} \quad (7)$$

$$\ln R_2 = \beta + \alpha_2 \ln K + \beta_2 \ln L + \gamma_2 \ln \text{Land}_2 + \delta_2 + \epsilon_{2i} \quad (8)$$

公式⑦与⑧中的 δ_i 为非观测效应， ϵ_{it}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使用 FGLS 方法来估计生产函数模型系数，结果见表 2。

最后，将上述待估系数带入式⑤和式⑥中求两部门的边际净收益值，比较两者的边际净收益差距。从资源经济学角度看，就是资源利用在两部门中边际净收益相等，则土地资源分配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当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远远高于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则土地资源分配的效率远不及帕累托最优效率，[28]用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除以非农业部门的边际收益，数值越接近于 1 表明土地资源分配效率越接近于帕累托最优状态，数值越偏离 1 说明越远离帕累托最优状态。

表 2 生产函数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系数估计	α	β	γ	LnA	R^2
农业部门	-0.9074*** (0.0408)	0.4374*** (0.0248)	0.3245** (0.1488)	7.0685*** (1.5816)	0.4354
非农业部门	0.1992*** (0.0364)	0.6425*** (0.0082)	0.0096** (0.0043)	4.4330*** (0.0824)	0.9437

注：***、**、*分别表示在 1%、5%、10%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差。下表同。

$$\text{土地资源分配效率} = \left| \frac{MR_1}{MR_2} - 1 \right| \quad (9)$$

3. 其他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控制变量包括人均占地面积、产业结构优化、政府支出规模、金融发展、财政收支压力。（1）人均占地面积。人均占地面积与土地资源分配存在密切关系，将人均占地面积作为控制变量用以控制土地面积对土地资源分配的影响。（2）产业结构优化。主要反映我国农业与工业、服务业的经济密度差异，以及经济发展的要素驱动。（3）政府支出规模。地方政府城市偏向的财政支出规模会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4）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作为中介工具促进资本从城市流向农村，有效积累农村资本，带动城乡融合发展；另一方面，由于金融存在“精英俘获”，将阻碍城乡融合发展。[32](5) 财政收支压力。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压力可能会导致土地城镇化的加速。各变量说明与统计描述见表 3。

表 3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组	变量名称	指标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0.1792	0.0523	0.0797	0.4430
	空间融合发展	空间融合发展水平	0.0362	0.0252	0.0018	0.1626
	经济融合发展	经济融合发展水平	0.0913	0.0321	0.0288	0.2709
	社会融合发展	社会融合发展水平	0.0517	0.0237	0.0111	0.1612
核心解释变量	土地资源分配	土地资源分配效率	1.4403	4.9410	0.0049	77.8665
控制变量	人均占地面积	年末常住人口/行政区域面积	0.2619	0.2868	0.0261	2.2758
	产业结构优化	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	1.6823	0.9177	0.3369	9.0036
	政府支出规模	政府财政支出/GDP	0.1551	0.1023	0.0091	1.3629
	金融发展	金融机构年末贷款余额/年末存款余额	0.5626	0.2685	0.1692	4.9222
	财政收支压力	(政府财政支出-财政预算收入)/财政预算收入	3.4799	4.8777	-0.4916	47.1886

由于土地要素在短时间内变化不大并依据数据的可操作性，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成渝地区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区县，共 134 个，年份包括 2000 年、2005 年、2008 年、2010 年、2013 年、2015 年和 2019 年。所用数据均来源于历年《四川统计年鉴》和《重庆统计年鉴》，其中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个别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进行补充。

五、实证结果与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先探讨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分配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再讨论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分配又是如何影响城乡融合发展，基准回归结果见表 4。

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由表 4 列（1）可知，土地资源分配的影响系数为-1.6377，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由土地资源分配的定义可知，土地资源分配指数越小越接近于帕累托最优，故土地资源分配指数越小越好，这表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按照农用地和非农用地的边际收益来确定土地资源分配效率，在不损坏土地生态、生存和生产的价值前提下，将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在不同部门、产业间，有助于提升地区经济效率，[33]从而有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在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土地资源分配的系数明显变小了，表明政府干预会减缓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地方政府既是国有建设用地的所有者，也是供给者和垄断者，在宏观调控配置城市建设用地和农用地时，地方政府也多表现出明显的非农偏向，更倾向于通过城市建设来扩大财政收入、彰显政绩。另外，城乡融合发展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要素遵循市场规则达到优化配置的目的，然而政府的过度干预打破了市场规则，严重影响了城乡土地资源分配效率，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扩张速度较快，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从而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

表 4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5)
被解释变量	城乡融合发展水平		空间融合	经济融合	社会融合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	-1.6377*** (0.2840)	-1.1138*** (0.2426)	-0.3970*** (0.0933)	-0.8942*** (0.1768)	0.1774*** (0.0501)
人均占地面积	0.6403*** (0.0478)	0.3630*** (0.0433)	0.1003*** (0.0167)	0.2443*** (0.0316)	0.0184** (0.0090)
产业结构优化	0.4139* (0.2236)	-0.1573 (0.1915)	0.0993 (0.0736)	-0.0794 (0.1396)	-0.1772*** (0.0396)
金融发展	-0.9509 (0.6002)	0.2453 (0.5229)	0.0601 (0.2010)	0.0796 (0.3812)	0.1056 (0.1081)
政府支出规模		0.3563*** (0.0197)	0.1006*** (0.0076)	0.2276*** (0.0143)	0.0281*** (0.0041)
财政收支压力		-0.4532*** (0.0391)	-0.0017*** (0.0150)	-0.3288*** (0.0285)	0.0311*** (0.0081)
_cons	0.0123 (0.0134)	0.0475*** (0.0118)	-0.0017 (0.0045)	0.0057 (0.0086)	0.0435*** (0.0024)
R ²	0.2056	0.4375	0.3077	0.3859	0.2046

接下来，考察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一级分指标的影响。由表 4 第（3）列、（4）列、（5）列可知，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城乡经济融合上，并且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但其抑制作用相比空间融合发展和经济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而言较小。资源优化配置本身具有经济增长效应，对于城乡经济融合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而对于城乡社会融合来说，本文的城乡社会融合指标主要体现在城乡教育、生活环境、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均衡程度，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农村和城市在居住、教育、医疗、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难以实现城乡均等化，因此着力解决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非均衡发展问题，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34]

控制变量结果显示，人均占地面积、政府支出规模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收支压力则呈现抑制作用。人均占地面积和政府支出规模分别揭示了城市的规模效应和地方政府对各项公共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情况，政府的财政支出也承担着财政转移支付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资源不对等，因此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然而，在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等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压力的增加会对城乡融合发展起到抑制作用，从而加剧了我国城乡不平衡发展。

2. 内在机制检验

为了验证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内在机制，分别验证农用地边际收益和非农用地边际收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结果见表 5。可见，农用地边际收益的提高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非农用地边际收益的增加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但其抑制作用较小， β_2 约接近于 0。在当前农用地边际效益与非农用地边际效益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提高农用地边际效益以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是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有效途径，通过土地流转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带动农村经济发展，[35] 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对比第（1）列、（3）列与第（2）列、（4）列发现，考虑政府干预过后，农用地边际收益和非农用地边际收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分别减少了 26.5% 和 27.4%，这与上述分析结论一致。

3.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

（1）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影响的稳健性，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见表 6）。鉴于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质是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因此主要采用工业化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合成指标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替代变量。[36] 在稳健性检验中，替换被解释变量并不改变各项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或者符号方向，有效支持了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且农用地边际收益与非农用地边际收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作用与上面论述类似。可见，研究期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稳健的促进作用。

表 5 农用地边际收益与非农用地边际收益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1)	(2)	(3)	(4)
农用地边际收益	0.0132*** (0.0014)		0.0097*** (0.0012)	
非农用地边际收益		-0.2930*** (0.1002)		-0.2128** (0.0841)
人均占地面积	0.5893*** (0.0460)	0.6217*** (0.0484)	0.3401*** (0.0418)	0.3477*** (0.0435)
产业结构优化	0.5191** (0.2165)	0.3475 (0.2272)	-0.0576 (0.1870)	-0.2246 (0.1931)
金融发展	-1.3425** (0.5797)	-1.1898* (0.6088)	-0.0549 (0.5100)	0.1777 (0.5279)
政府支出规模			0.3407*** (0.0193)	0.3640*** (0.0197)
财政收支压力			-0.4255*** (0.0382)	-0.4461*** (0.0395)
_cons	-0.0160 (0.0134)	0.0185 (0.0136)	0.0242** (0.0119)	0.0509*** (0.0118)
R ²	0.2579	0.1813	0.4674	0.4273

(2) 内生性检验

另外，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存在逻辑上的反向因果关系以及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都将导致结果出现偏误。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来弱化土地资源配置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过程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选择农用地板块零散度作为工具变量，该变量符合工具变量的外生性和相关性两个约束条件：一是农用地板块零散度与城乡融合发展以及遗漏变量无关联；二是与土地资源配置紧密相关，农用地板块越趋向于规模化，则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更高。其内生性检验结果见表 7，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显示检验值大于 10% 的临界值 16.38，表明所用工具变量符合外生性的假设，内生性检验结果显示该方程组不能拒绝“土地资源配置具有内生性”的原假设，且该方程组的各个系数均与上述基准回归结论一致，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依旧能够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1)	(2)	(3)
土地资源配置	-2.1960*** (0.5476)		
农用地边际收益		0.0141*** (0.0027)	
非农用地边际收益			-0.2776 (0.189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_cons	0.2574*** (0.0265)	0.2257*** (0.0274)	0.2647*** (0.0267)
R ²	0.4194	0.4270	0.4093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成渝地区为研究区域，对其 134 个区县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和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了评价，并探讨两者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之后，其促进作用依旧稳健，但在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将明显缩小。（2）土地资源配置对城乡经济融合发展、城乡空间融合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对城乡社会融合发展具有抑制作用。（3）具体考察内在机制，无论有没有政府干预，农用地边际收益的提高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非农用地边际收益的增加对城乡融合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但其抑制作用较小。

表 7 内生性检验结果 (IV-2SLS)

解释变量	(1)	(2)	(3)
土地资源配置	-17.4903* (9.6115)		
农用地边际收益		0.0378** (0.0184)	
非农用地边际收益			-0.0705*** (0.02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弱工具变量检验	32.770	60.937	76.590
内生性检验	3.288*	4.091**	14.055***

土地资源配置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主要抓手，通过研究结论主要得到以下几点启示：第一，适度减少政府干预，提高土地的市场化配置。政府过度干预会降低土地资源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促进作用。根据实际经济发展需要，适度减少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化配置的不当干预，加快地方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但在加强土地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不能否定政府在土地用途管制中为了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而发挥的引导和监督作用，政府还应对土地市场进行资源配置过程中产生的负外部性加以限制，对正外部性给予补偿。第二，增加农业用地边际收益。成渝地区的经验表明，农用地边际收益能显著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故应提高农用地边际收益，促进农地规模化应用和农业产业化经营，特别是对于重庆、四川等这样的西部地区而言，尤其要加强农地的规模化经营，进一步推动农地流转和加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非农转移，通过提升农地收益来促进西部乃至全国城乡地区的融合发展。

参考文献：

[1] 郑振源，蔡继明．城乡融合发展的制度保障：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权[J]．中国农村经济，2019，（11）：2-15.

[2] [26] 刘新智，周韩梅，董飞．耕地利用转型与农村经济增长：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J]．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11）：102-111.

[3] 陈磊，姜海．主体功能区导向下的土地资源空间配置：对土地生长空间演进规律的理性思考[J]．中国土地科学，2019，（10）：22-30.

[4] 张海鹏．中国城乡关系演变70年：从分割到融合[J]．中国农村经济，2019，（03）：2-18.

[5] [7] 张海朋，何仁伟，李光勤，等．大都市区城乡融合系统耦合协调度时空演化及其影响因素——以环首都地区为例[J]．经济地理，2020，（11）：56-67.

[6] Liu Y S, Cong S, Li Y R. Differentiation Regularity of Urban-Rural Equalized Development at Prefecture- Level City in China [J].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2015, 25 (09): 1075-1088.

[8] 陈肖飞，姚士谋，张落成．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中国城乡关系统筹的理论与实践问题[J]．地理科学，2016，（02）：188-195.

[9] 陈丹，张越．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逻辑、关键与路径[J]．宏观经济管理，2019，（01）：57-64.

-
- [10] 曹 飞 . 城乡土地利用视角下的新型城镇化: 制度桎梏与协同模式 [J] . 经济体制改革 , 2019, (02): 27-32.
- [11] 盖庆恩 , 朱 喜 , 程名望 , 等 . 土地资源配置不当与劳动生产率 [J] . 经济研究 , 2017, (05): 117-130.
- [12] 刘明辉 , 卢 飞 . 城乡要素错配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J] . 农业 技术经济 , 2019, (02): 33-46.
- [13] [17] [19] [21] [23] 陈坤秋 , 龙花楼 . 中国土地市场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 [J] . 自然资源学报 , 2019, (02): 221-235.
- [14] 张合林 , 王亚晨 , 刘 颖 . 城乡融合发展与土地资源利用效率 [J] . 财经科学 , 2020, (10): 108-120.
- [15] 王文彬 . 基于资源流动视角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 [J] . 农村经济 , 2019, (07): 95-102.
- [16] 叶兴庆 . 在畅通国内大循环中推进城乡双向开放 [J] . 中国农村经济 , 2020, (11): 2-12.
- [18] 李汝资 , 刘耀彬 , 王文刚 , 等 . 中国城市土地财政扩张及对经济效率影响路径 [J] . 地理学报 , 2020, (10): 2126-2145.
- [20] 赵扶扬 , 王 忦 , 龚六堂 . 土地财政与中国经济波动 [J] . 经济研究 , 2017, (12): 46-61.
- [22] 戈大专 , 龙花楼 .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J] . 地理学报 , 2020, (06): 1272-1286.
- [24] 傅 勇 , 张 晏 . 中国式分权与财政支出结构偏向: 为增长而竞争的代价 [J] . 管理世界 , 2007, (03): 4-12, 22.
- [25] 李 郇 , 洪国志 , 黄亮雄 . 中国土地财政增长之谜——分税制改革、土地财政增长的策略性 [J] . 经济学 (季刊) , 2013, (04): 1141-1160.
- [27] 高 波 , 孔令池 .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经济增长效应分析 [J] . 农业技术经济 , 2019, (08): 4-16.
- [28] [29] [30] [31] 李 辉 , 王良健 . 土地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与优化途径 [J] . 中国土地科学 , 2015, (07): 63-72.
- [32] 郭海红 , 刘新民 , 刘录敬 . 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差距及动态演化 [J] . 经济问题探索 , 2020, (10): 1-14.
- [33] 邓慧慧 , 赵晓坤 , 李慧榕 . 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如何影响经济效率? ——来自浙江省“亩均论英雄”改革的经验证据 [J] . 中国土地科学 , 2020, (07): 32-42.

[34] 杨晓军, 陈浩. 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 (12): 127-145.

[35] 刘新智, 周韩梅, 王小华. 农地流转缩小农户收入差距了吗? ——基于 CFPS 的微观证据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2021, (04): 501-510.

[36] 刘红梅, 张忠杰, 王克强. 中国城乡一体化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引力模型 [J]. 中国农村经济, 2012, (08): 4-15.